

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

——基于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活动的考察(1938—1945)

赵国壮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中国蚕丝业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为应对丝业危机并进而统制丝业经济,在政府扶植下,后方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其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整个蚕丝改良事业。丝公司自身股本极其有限,其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各项业务均依赖于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且年年借款、季季借款,属于借贷性公司运营。尽管如此,丝公司却在战时年年有盈余,并在后方丝业危机应对、外销生丝生产、蚕丝业改良等方面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丝公司的融资及经营活动中不难发现,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状况为:经济统制与丝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金融业与丝业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丝业融资 大后方蚕丝业

中国是蚕桑古国,蚕丝的生产及贸易源远流长。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蚕桑业逐渐发展起来。明清时期,该区域的蚕桑生产已在全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①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地区因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生齿稠衍,人工低廉,而天然适宜于栽桑养蚕,早有“蚕丛古国”之称;^②近代以来,四川蚕丝生产仅次于江浙等省,为中国重要的蚕丝产地,省内蚕桑生产区域逐渐集中于以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及以南充、阆中、三台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而就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而言,明清以来,黔、桂、滇等省亦养蚕缫丝,但是产量颇少,在我国产丝地位上所占分量极为有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全面的市场份额争夺战,可以说自此以后整个中国手工行业均面临着来自日本同行的竞争。在此竞争下,中国各业均出现不同程度

[作者简介] 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重庆,400715,邮箱:zhaoguozhuang2007@163.com。

* 本文提交“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2013.9.13—17重庆)讨论,感谢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教授、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等人的评议及建言。本文受到2013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经济调查文献的整理与利用研究”与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厚植抗战经济力:大后方特产行业与抗日战争”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中肯意见。

①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蚕丝产量的论述,可以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

的危机,如丝织业出口受阻、面粉业遭排挤、土布业销售不旺、制糖业生产危机等等情况。^① 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 响,四川蚕丝业发展步履维艰;抗战爆发后,长江销路阻断,川丝外销困难重重。为了挽救四川蚕丝业,川省政府一方面效仿江浙丝业统制办法对川丝产销实施统制;另一方面整合省内缫丝工厂成立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垄断省内一切改良蚕丝事业。就近代蚕丝业研究成果而言,相关论著林林总总,颇为丰硕,不过,学界对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的关注并不多。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台湾学者陈慈玉的系列论著。例如,她以蚕丝试验场为例,利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农林部档案,着重探讨了战时四川蚕丝业改进过程及其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比较同时期日本在沦陷区中的蚕丝政策,阐明了四川蚕丝业在战时蜕变所具有的意义。^② 随后,陈慈玉推出了《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一书,该书分别以广东、上海、四川为例,通过对这三个中国蚕丝业中心区域的历史地理条件、蚕桑生产环境、生丝生产制能力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原因、发展的状态及最后归宿作了研究分析。^③ 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公司)为例,通过对其战时融资及经营活动的梳理,从行业融资角度来窥视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状况,并拟对战时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金融业与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关联问题略作讨论。

一、20世纪30年代后方丝业危机及丝公司的成立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丝业竞争及人造丝进口激增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丝业危机之声充斥国内舆论,以丝业危机及救济丝业为名的论著广见于报刊杂志。^④ 这次危机的波及面较广,不仅江浙地区蚕丝业受到较大冲击,而且西南地区蚕丝业发展也呈现出步履维艰的局面。例如,曾在1920—1930年间处于极盛时期的四川丝业,自1931年后,“因为内受天灾与时局不靖之影

① 如丝织业,当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蚕丝业尚处于形成阶段时,美国人仍更喜欢中国丝,但当华丝价格上涨得太高时也购买日丝。那时,美国顾客抱怨日丝不规则,质量低劣,同时也抱怨中国商业活动不守信用。不过,日本人注意到了外国顾客的需要,并很快作出了标准化和机械化的努力。到1909年,日本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国(方显廷:《中国的缫丝业发展及其分布的考察》,《中国经济月报》第7卷第12期,1934年12月)。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利用货币贬值在美国市场跌价竞销,另一方面,在生产上力求高质量,规格标准化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以致使华丝在美国市场上失去了与日丝的竞争力(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日本丝商到20世纪初已经开展蚕丝的直接出口业务,最后终于把外国商行从本国该业务中排挤出去;中国丝商跟他们的日本对手不同,仍然保持着外国商行和缫丝厂及内地供应者之间的中介人的地位;尽管这一地位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大发其财,但是归根结底,这使他们跟其日本竞争者相比,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而日商直接推销商品的技术使他们对国外不断变化的爱好风尚极为敏感(Lillian M. Li,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美]李细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又如面粉业,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商人曾于1908年以100万元资金在铁岭创办满洲制粉株式会社。到1934年,在关东军的支持下由日本国内制粉界的日本制粉、味の素会社等12个财团,集资200万,后增加到1000万,联合成立“日满制粉会社”,控制11个工厂,日生产能力40300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页)。再如土布业,20世纪30年代中国土布销售不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全国性原因是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在中国设厂生产大量机织布,并大量仿制土布,这不仅严重打击了手织布,而且严重冲击了中国国内市场的既有格局,迫使原来为农村手织业生产原料的中国纱厂因机纱销路不振,为求生存而大量生产布匹,这就使原有的棉纺织业中的大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之间的协调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加剧了农村土布的市场困难(林刚:《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另外,就制糖业而言,在日糖大力开拓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糖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严重的糖业危机(赵国壮:《日本糖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竞争1903—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陈慈玉:《抗战时期的四川蚕桑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

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

④ 较为著名的有吴兆名:《中国丝业的危机》,《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1号;《百业凋敝声中之丝业》,《经济旬刊》1934年第2卷第2—3期;薛弘训:《中国丝业之衰落及其救济》,《商学期刊》1929年第8期;《丝业之危机》,《银行周报》1932年第16卷第18号;《挽救丝业厄运谈》,《钱业月报》1933年第13卷第11期等。

响,外受日丝倾销与人造丝之压迫,始进入衰落时期”;^①川北本为川省丝业中心,盛时生丝产量达川省生丝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但自1931年以后,已经锐减了90%左右;川南区生丝产量在盛时曾达川省生丝总量的25%,在衰退期时虽有缅甸、印度市场的支撑,但亦减少了75%。^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川省蚕丝业的危机持续加重,因受沿海出口通道阻断影响,丝价下跌,面临着一定的销售危机。例如,1938年1月27日,三台丝纱同业公会主席封郁其(系集义珍经理,该号共有股本6000元)致函美丰商业银行潼川办事处刘葆三,函称“自全面抗战以来,水陆交通均已封锁,潼丝出路无形顿滞”。^③同年,丝公司在重庆积存丝货达528担,其中一部分押存于四行贴放委员会;土丝存淹者约700担,此项陈丝“一时不易求得销路,积压既久,亏折甚巨”。^④在丝公司及有关各方的努力下,川丝转走西南陆路输出,然而困难重重,“1937年丝公司产丝1400担,运销上海者仅百余担,为打开销路,丝公司经理亲赴越南、缅甸考察销路,之后,将一部分生丝改制粗丝销往越南、缅甸;一部分售与云南帮”。此时川丝“皆由陆路经云南运销安南(越南),以汽车装运,然因此项公路修理欠佳,如遇雨天,泥泞不堪,车行极感困难”,由重庆运往昆明约需7日,再由火车转运河内。每担生丝由重庆至河内运费为:重庆至昆明汽车费45.0元,昆明至河内火车费9.0元,保险费(每千元18元)11.7元,昆明特税4.0元,内河消费税(税率3%)19.5元,杂缴2.0元,合计91.2元,约占1938年每担生丝价格650元的14.03%。^⑤

在川省丝业衰退时期,省内丝商曾经先后联合组织久和、大华、新华等生丝贸易公司,以期减低成本,突破困境,但均未获成功。1936年春,省政府认股改组成立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5月,该公司与四川省营蚕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更名为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丝公司主要经营制造改良蚕种、收买改良蚕种、缫制及运销改良蚕丝等事项。丝公司成立后,川省府开始实行改良蚕丝统制政策,^⑥赋予“丝公司以独家改良蚕种与独家收购改良蚕茧之权,公司有无偿赠送农民改良茧种,与遵照官价收尽农民所产改良蚕茧的义务”,^⑦“举凡营育桑苗,制造茧种,收茧,缫丝,运销诸端,莫不由该公司作有系统之经营”。^⑧学界对于丝公司并未有专门性研究,不过相关研究成果对其有所涉及,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⑨

丝公司遵照四川省政府颁布的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设立,并按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命名。总部设于重庆陕西路92号,总公司内部设置股东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设有董事长、常务董事、监察人等职位,总经理负全责管理公司一切事务,并设襄理、协理及制种总技师、制丝总技师辅助

①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4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224页。

② 陈慈玉:《抗战时期的四川蚕桑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

③ “关于美丰银行三台办事处与总行洽商代卖潼丝的函”,第232—244页,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6—0014—0369。

④ 赵永余:《战时四川省之丝业》,《经济动员》1938年第2期。

⑤ 赵永余:《战时四川省之丝业》,《经济动员》1938年第2期。

⑥ “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办法大纲”共14条,赋予了丝公司独享经营川省改良蚕丝事业的权力,大纲具体内容参见《蚕茧与蚕丝业近况》,《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10卷第1期。

⑦ 林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1946年第10期。

⑧ 《四川丝业公司之过去与将来》,《联合经济研究室通讯》1946年第4期。

⑨ 其一,从蚕丝业角度对其进行简要论述,例如,胡社牲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蚕业》(《四川丝绸》1995年第4期)中对战时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销售及部分抗争情况作了简单地介绍;陈慈玉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蚕桑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演变过程;张忠民在《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经营预算制度》(《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一文中提及经济部中央农业试验所1938年对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情况。其二,袁剑秋:《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荫贵:《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莫子刚:《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上述战时企业公司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其办理相关事宜,下辖技术室、统计室、总务科、业务科、会计科、稽核科、秘书室、技术室等科室。在重庆及川东川北等地分设分公司、办事处、制丝厂、制种场及购茧庄等分支机构,具体设置情况为:川东区、南充区、三台区、阆中区、成都、上海等六个办事处;第一、二、三、四、五制丝厂;北碚、巴县、南充、西充、仁和、阆中、三台等七个蚕种制造场;北碚及南充两个冷藏库;川东区副产品厂;合川及澄江镇两个转运处;川东区、南充区、阆中区及三台区等四个茧庄。^①“就设备而言,固然比战前各民营丝厂齐全,而且自桑园至丝厂一应俱全,这似乎是当局极力推展外销丝和军需丝之制造时所采取的一贯作业政策的结晶;此公司配合蚕丝试验场所扮演的角色,在1940年代初期以降和川南地区的乐山试验区平分四川丝业之天下”。^②

丝公司第一任董事长为宋子文,常务理事有宋子文、胡子昂、何北衡、席德柄、钱新之、康心如、邓汉祥、范崇实、顾季高、刘航琛等人;董事有徐广迟、陈介生、宁芷村、李奎安、浦心雅、张表方(张澜)、杨晓波、任望南、尹志陶、戴自牧、潘昌猷、王君鬚、傅沐波、杨赞卿等人;常驻监察人为吴晋航,监察人有许印若、席文光、温少鹤、何静源、张朔、石体元、喻元恢、税西恒、江昌绪、杨灿三、卢澜康等人。公司总经理为范崇实,协理为罗永烈、陈济光,襄理有温之章、盛润生、陈树庚、熊予昌、陈光玉、胡昭铭等人;制种总技师为陶英,制丝总技师为张复昇,总务科主任为彭树鑫,副主任为唐述百,业务科主任为谢思洁,会计科主任为钱家骅,副主任为唐文昭。之后,丝公司董监事也经过多次调整,例如,1942年8月10日,胡振遼向四联总处呈报四川丝业公司改选后董监事名单,董事有何北衡、钱新之、顾季高、邓汉祥、张群、胡子昂、刘航琛、宋子文、范崇实、康心如、杨晓波、潘昌猷、徐广迟、代自牧、浦心雅、李奎安、张表方、尹志陶、杨赞卿、傅沐波、王君报、任望南、陈公生、席德柄、宁芷村等人;监察有许印君、温少黥、张朔、吴晋航、喻元恢、卢澜康、石体元、王伯天、汤一峤、席文光、税西恒、夏道湘等人。^③

丝公司部分董监事出身情况,可从表1中窥见一斑:

表1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监名册(1942年)

职别	姓名	备考	职别	姓名	备考	
董事长	何北衡	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长	董事	陈济光	本公司协理	
常务董事	刘航琛	川康、川盐银行董事长		刘敷五	中国银行渝行副理	
	赵雨圃	中国银行渝行经理		彭树鑫	本公司襄理	
	张叔毅	交通银行渝行经理		盛润生	本公司襄理	
	徐寿屏	中国农民银行渝行经理		张表方	国民政府参政员	
	胡子昂	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		谢思洁	本公司业务主任	
	康心如	美丰银行总经理		何兆青	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邓汉祥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常驻监察人	温少鹤	重庆市生丝输出业公会理事长
	吴晋航	和成银行总经理		监察人	喻元恢	华懋公司总经理
	何静源	兴记贸易公司总经理	卢澜康		大夏银行协理	
范崇实	本公司总经理	龚农瞻	美丰银行协理			

① “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事业概况调查表”(四川丝业公司),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0005—0015。

② 陈慈玉:《抗战时期的四川蚕桑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

③ “呈报四川丝业公司董监事名单一份请察存”,第50—5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91。

续表 1

职别	姓名	备考	职别	姓名	备考
董事	戴自牧	川康兴业公司董事	监察人	胡铭绅	和成银行沪行经理
	徐广迟	中国银行沪行经理		罗永烈	四川省银行副总经理
	吴景伯	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杜仲明	自营商业
	吴良佺	中国农民银行渝行副经理		王大睿	中国农民银行渝行襄理
	袁玉麟	川康银行经理		吴忠忱	中国农民银行渝行副经理
	王素功	交通银行渝行副经理		张能一	交通银行渝行副经理
	温之章	本公司协理		彭革陈	川康兴业公司总稽核
				余成源	四川省政府会计长

资料来源：“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监名册”，第9—10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0005—0015。

表1所列董监事共37位，其中银行界人士有19人，包括国家银行（中国、交通、农民三家）、地方政府银行（四川省银行）及商业银行（川康、川盐、美丰、和成、大夏）等战时川省主要银行；四川省府人士4人（建设厅长、财政厅长、省府秘书长及省府会计长）；国民政府参政员1人，商业公司代表7人（川康兴业公司、兴记贸易公司、华懋公司），丝公司经理6人（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主任）。丝公司董事长何北衡，四川罗江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刘湘幕府，先后任江巴司令部顾问、巴县知事、民生公司副董事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重庆市警察局长等职；1937年，何出任四川省建设厅长，并以建设厅长身份担任丝公司董事长一职；在其任职期间，他积极倡导成立四川省矿业督导处、四川省电话管理处及无线电总台、合作事业管理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等经济管理（指导）机构，并组建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四川药材公司等企业，谋川省经济发展之快速发展。^①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四川合江县人，与刘航琛、何北衡同为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他们先后参加刘湘幕府。1935—1936年间，范崇实先后担任重庆、成都两处警察局局长，“办事有计划，有魄力，对于警政的刷新，极负政声”，^②积累极其广泛的人脉、政绩。因此，从公司董监事及经理人员的出身情况不难看出，丝公司有较为深厚的政治背景。

总之，丝公司在危机中整合而起，依托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扶植，挟其政治资源优势，从制种、收茧、缫丝、售丝等整个蚕丝生产环节上，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蚕丝改良事业，成为后方丝业中的托拉斯企业公司。丝公司的经营策略属于借债性企业经营，自身资本极其有限，甚至微不足道，完全依赖利用向外融资的资金手段，维持公司各项事业正常运行，并推动后方改良蚕丝事业发展。

二、丝公司的融资活动及蚕丝经营

战时，“川省蚕丝已濒于破产地位，若非政府之救济，几于无法维持”，是故，川省政府在组织成立丝公司时，采取官商合办形式，募集官商股本，^③其中，官股占了绝大部分，“政府既投有大量资本，而又将省营之10个制种场移交丝公司办理，并拨款25万元”。^④同时，为保证商股认缴，川省府对公司之商股担负保息保亏之责。^⑤之后，因应需要，逐年增资，丝公司先后邀请经济部、农本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川省金融界、蚕区地方士绅、蚕农公司职员及蚕业推广委员会全体职员加

① 四川省德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德阳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0页；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9卷，“何北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3页。

② 林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1946年第10期。

③ 《四川丝业公司之过去与将来》，《联合经济研究室通讯》1946年第4期。

④ 赵永余：《战时四川省之丝业》，《经济动员》1938年第2期。

⑤ 林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1946年第10期。

人投资,1941年又邀请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加入。具体情况为:1937年成立之初,资本140万元,1938年增资为200万元,同年秋又增资为300万元,具体情况为:政府100万元,下游资本80万元,本省金融界54万元,丝商40余万元。^①

1937—1940年丝公司历年资本及股份变化如表2:

表2 1937—1940年间丝公司资本及股份变化表

年份	股本金额(元)	股份百分比		
		四川省政府	国家银行及机关	商业银行及私人股份
1937年	1 400 000	70%	0%	30%
1938年春	2 000 000	58%	15%	27%
1938年秋	3 000 000	30%	30%	40%
1940年	4 000 000	22%	33%	45%
1941年	12 000 000	14%	51%	35%

资料来源:林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1946年第10期。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丝公司历年股本变化中,政府官股呈下降趋势,银行股本成逐年上涨态势。1937年成立之初,官股占到70%,商业银行及私人仅及30%;而1941年之际,官股仅为14%,公私银行业股份已达80%以上。

1941年5月2日,在丝公司临时股东会议上,何北衡主席报告了增资入股情况:丝公司新增现金股400万元,截至4月30日止已经募足,连同原有股本800万元,共计收足1200万元;新增股东及其所认股额分别为:中国银行50万元、交通银行5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62.5万元、四川美丰银行30万元、四川省银行13.69万元、川盐银行17.99万元、德丰公司2.5万元、和成银行5万元、川记5万元、康记5万元、和记0.74万元、经济部2万元、川康银行3.3万元、富华公司150万元、扬典章1万元、杨依生1万元、余述人0.06万元、杨育恒0.03万元、温少鹤0.1万元、刘式民0.02万元、周道0.01万元、张树藩0.01万元、唐述百0.05万元。^②

表3 1942年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1200万元股本股东情况一览表

户名	姓名或代表名	股数	股银(元)
王开汉		120	12 000
美记	康心如	1 000	100 000
丰记	龚农瞻	1 000	100 000
银记	彭肇怀	1 000	100 000
行记	林仲杰	1 000	100 000
美丰银行	康嗣群	1 000	100 000
美丰银行	邓愚山	4 000	400 000
范崇实		308	30 800
会记	范崇实	102	10 200
实记	范崇实	40	4 000
聚记	杨灿三	2 250	225 000
永聚公司	王宪之	600	60 000
龄记	宁芷村	2 000	200 000
经济部	翁文灏	600	60 000

① 《四川丝业股份公司之调查》,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5—0001—0859。

② 《范崇实关于报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记录上重庆社会局德呈》,第116页,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社会局全宗,档号0060—0002—0230。

续表 3

户名	姓名或代表名	股数	股银(元)
杜仲明		120	12 000
四川省银行	潘昌猷	600	60 000
四川省银行	卢澜康	50	5 000
四川省银行	何兆青	1 269	126 900
谦记	卢澜康	104	10 400
康记	卢澜康	100	10 000
厚记银行	朱名谦	2 000	200 000
中交记	宋子文	2 000	200 000
中内记	顾敦甫	1 000	100 000
中成记	孙祖瑞	1 000	100 000
中上记	徐广迟	2 000	200 000
中万记	陶少松	1 000	100 000
中坊记	王君报	1 000	100 000
中国银行	宋子文	4 000	400 000
中国银行	徐广迟	3 040	304 000
通记	吴晋航	1 120	112 000
懋记	何北衡	400	40 000
华懋公司	喻元恢	60	6 000
华懋公司	吴晋航	820	82 000
记	宁芷村	1 000	100 000
庸记	宁芷村	500	50 000
尹良莹		60	6 000
陈让卿		14	1 400
交记	钱新之	2 000	200 000
交总记	唐寿民	1 000	100 000
交渝记	浦心雅	1 000	100 000
交通银行	张朔	1 250	125 000
交通银行	钱新之	4 750	475 000
张表方		60	6 000
茂记	张表方	40	4 000
陈丽生		100	10 000
刘航琛		200	20 000
川记	刘航琛	1 000	100 000
川记	刘航琛	500	50 000
川盐银行	刘航琛	1 469	146 900
盐记	刘航琛	1 938	193 800
川康银行	刘航琛	330	33 000
川盐银行	刘航琛	330	33 000
四川省政府		16 566	1 656 600
中农川记	顾季高	2 000	200 000
中农康记	徐子青	2 000	200 000
中农黔记	王伯天	1 500	150 000

续表 3

户名	姓名或代表名	股数	股银(元)
中农湘记	侯哲莽	1 500	150 000
中农桂记	许印若	1 500	150 000
中农赣记	尹志陶	1 500	150 000
农民银行	许印若	500	50 000
农民银行	王伯天	6 250	625 000
农记	叶琢堂	2 000	200 000
诚记	董庆伯	22 010	2 201 000
富华公司	夏道湘	7 500	750 000
富华公司	席德柄	7 500	750 000
……	……	……	……
合计		120 000	12 000 000

资料来源:根据《范崇实关于报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记录上重庆社会局的呈》(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社会局全宗,档号 0060—0002—0230,第 119—145 页)中股东一览表整理而来(节略表)。

从表 3 来看,经过 1941 年的增资扩股,到 1942 年为止,丝公司的总股本为 12 000 000 元,每股 100 元,共计股数 120 000,散户股数最少为 2 股,政府股仅有经济部 600 股及四川省政府 16 566 股,约占总股数的 14%,而丝公司的主要股东为银行业:一是中国、交通、农民三家国有银行持有 40 790 股,约占 34%;二是川盐、川康、聚兴诚、美丰等川帮银行约持有 33 000 股,约占 28%;三是四川省银行。另外,国民政府组建的华懋及富华两家公司也拥有一定比例的股本。

1945 年,丝公司再次增资扩股,此次增加资本为 1 亿元,新增资本 7 000 万元,已于该年 4 月底募足。具体情况为:认加两股者,中国银行 481.2 万元、中国农民银行 562.5 万元、交通银行 300 万元、复兴公司 450 万元、美丰银行 400 万元、四川省银行 140 万元、其他股东 19.6 万元,共计 2 353.3 万元;认加一股者,川康兴业公司 850 万元、刘航琛 30 万元、宁芷村 30 万元、聚兴诚银行 84 万元、其他股东 114.23 万元,共计 1 108.23 万元;股东除照认加两股外并接受其他股东让出股额加购新股者有,川盐银行 380 万元、和成银行 370 万元、川康银行 455 万元、华懋公司 100 万元、物产公司 90 万元、华源织造公司 84.85 万元、中源贸易行 47 万元、华康银行 50 万元、兴记公司 850 万元、杨佺生 25.5 万元、杜仲明 100 万元、胡天龄 96.75 万元,职员股 789.42 万元,其他股东 1.05 万元,共计 3 538.47 万元。三项共计 7 000 万元,委托川康、美丰、和成三家银行分别代收。^①

从历年增资的情况来看,随着官股的式微,国有银行及川帮银行控制了丝公司的股权,且范崇实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丝公司的具体运营工作,因此,可以认为丝公司的商业性质较为明显。^② 丝公司虽享有独占改良蚕丝事业经营之各种权利,并逐年增资,但终因自身资本有限,无法完成经营业务,多是携其政治资源向外通融资金,维持公司各项事业正常运行。

(一) 1938—1939 年融资情况

1938 年,丝公司收茧缫丝共需 260 万元,丝公司虽以制种场全部财产向农本局以利率八厘押借

^①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大会记录》1945 年 6 月 26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和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 0300—0001—0469,第 169—171 页。

^② 战时丝公司股本演化趋势与中国茶叶公司、复兴公司、富华公司有较大的差异,例如,战时国民政府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控制了茶叶公司股权,该公司遂成为政府贸易统制的工具之一。参见郑会欣的《从官商合办到国家垄断:中国茶叶公司的成立及经营活动》(《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及《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等。而丝公司则通过银行注资形式增资扩股,随着官股的式微,国有银行及川帮银行逐渐控制了丝公司股权。产生这一差别的最大因素在于茶叶公司经营活动重在贸易,而丝公司则重在生产,生丝贸易则由复兴公司及富华公司垄断。

30万元,但不敷使用,为此,“由省银行、川康银行、川盐银行、美丰银行等与农本局共组一新业银公司,以一分一厘利率贷款120万元,并以厂房、机械向省金融界抵押借款40万元,另外,以存渝丝货向贸易调整委员会抵押借款”。^①1939年春,丝公司与四川美丰等订立“1939年春季财产抵押借款合同”,因营业方面需要资金周转,而以自有制丝厂、制种场及购茧庄全部房产机器及设备作为抵押,向四川美丰、川盐等银行借款100万元,利率定为月息一分,每3个月结算一次,由丝公司另以现款偿还;借款支用期间定为4月15日至4月30日两期,各支用国币50万元;归还办法为1939年11月30日付还40万元整,以后每月底付还国币15万元,至1940年3月底还清。^②

(二)1940年融资及经营

以往丝公司向国家行库借款均系由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单独承做,而自1940年开始,改由四行按贴放比例承借款项。(1)春季茧丝借款,计设定茧丝质借款项总额为国币1207万元整。具体分配方案为:贷款总额的4%,计48.28万元,由四川省行、聚兴诚、川盐三行分摊;贷款总额的96%,计1158.72万元,由四行按35:35:20:10贴放比例分摊承借。中国银行渝分行为代表行,双方于1940年5月正式签订合同。^③(2)秋茧借款。1940年9月,丝公司为该年秋季分发改良蚕种,预计收购鲜茧需款720万元、收茧费用64万元、缫丝需款200万元,共需984万元,拟按成本九折押借885.6万元。(3)生丝押款。1940年6月,丝公司以各制种场需款迫切起见,拟以秋茧种40万张,按每张3元,押借135万元,以及现押中国银行已售与贸委会秋丝420担(此丝照每担均价3000元,除原在中国银行每担押款1600余元,现每担丝尚余1300余元),按每担余额1300元计,押款54.6万元,两项共计押款189.6万元,函商渝分处洽订借约。当时,渝分处核定茧种未便照做,秋丝准按3000元八五折作押,仍由中国银行代表与该公司洽办借款手续,立有借据(并无合约),订定以生丝394担,按3000元八五折作押,计借款总额为国币1004700元。(4)蚕种增产贷款。1940年10月,丝公司以过去产量不巨,物价平稳,尚能应付,今年物价步涨,工资增高,按照计划,本年秋季应制茧种35万张,每张预算成本4元,约需成本140万元,函请总处拟照成本八折分期贷款制造改良蚕种。与此同时,农本局及四川农业改进所也分别代其致电四联总处请求准予贷款。四联总处经第53次理事会决议“查该公司所送成本估计表,每张4元,尚属适当,惟其中财产折旧并非直接支出,场务、财务及管理费用,应由该公司自行另筹,所有蚕种生产直接费用(如原蚕种费、桑叶费、蚕纸制造、人工制造费用、冷藏费用等),合计约需100万元,准按八折计算,贷给80万元,交由渝分处参照办理”。^④

1940年全年,丝公司共计向银行贷款4笔,计总金额为2094万余元,主要用于春季收蚕制丝、秋季收茧制丝及制造改良蚕种等事项。据该年丝公司营业报告书来看,是年丝公司“营业略有盈利,而业务上艰难则十倍于以往各年”。在制种方面,1940年春秋两季,丝公司共制种71万张,平均成本达4元以上,而秋季成本特贵:首要原因在于是年以来,粮食价格飞跃上涨,百物腾贵,人工价昂,关于制种作业所需之人工特多,因此成本增高;其次,丝公司有一二种场自有桑园,但尚未成熟,因应农村需要蚕种之殷切,定购桑叶冀图多制,迨至蚕儿盛食期中,因丝价上涨,蚕农率多以所产桑叶,另售他人种场,致使丝公司之作业大受影响,结果不得不加价以每斤1元以上之价买进桑叶,始得挽救;再次,制种所需要药品、器材皆从海外运来,丝公司以前储备者已消耗殆尽,临时购办,价昂而又不易购得;最后,在蚕种冷藏方面,尤为重要,该年敌机肆虐,南充冷气库及化龙桥冰库几遭不测,现已准备迁移

① 赵永余:《战时四川省之丝业》,《经济动员》1938年第2期。

② “关于抄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美丰等银行借款合同之函附合约”,第418—422页,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6—0013—0020。

③ “关于检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春、秋季借款合同及办理经过概况的呈、附合约”,第173—202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88。

④ “关于检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春、秋季借款合同及办理经过概况的呈、附合约”,第173—202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88。

南库于乡间,并于化龙桥另建分库一所,1941年春用蚕种安全散发于农村当无问题。在收茧缫丝方面,1940年春秋两季,共收鲜茧225万公斤,平均价格春季5.7元,秋季3.9元,两季平扯4.5元;每担生丝之茧本达4000元以上,全年各制丝厂共缫各种条分生丝5100余担,每担约需缫工费900元,若按季节分析,则春季约五六百元,秋季以后则达1000余元。在售丝方面,1940年收购原料,约可分成丝3500担,加上年盘存丝茧共得丝7400余担,该年已销出者3400余担,每担平均得价约3000元,幸将上年所存原料两扯填补,得免亏损。另外,到1940年秋季为止,丝公司独享改良蚕茧之权利被终止,对丝公司业务有一定的影响。^①

(三)1941年融资及经营

是年2月22日,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致函四联总处,函称“该丝公司因应农村之需要,该年春季各种场共应制造蚕种50万张,而因物价飞涨,人工增高,所需资金为数至巨,拟请照预算每张需成本7.221元计算,共需资金361万元,按照八折贷款2888496万元”。^②同年秋,丝公司又因制种、收茧、缫丝等事项向四联总处申请贷款两笔。8月14日,丝公司“以本年秋季各蚕种场,即将开始,预定各场共制蚕种25万张,每张制造成本实需8元,共成本200万元,拟请按八折贷放160万元,以制成蚕种作押,除请川省府担保外,并由同意之银行保证,一切条件悉照本年春季蚕种贷款办法”。另外,丝公司又因秋季收茧缫丝向四联总处申请借款1350万元,四联总处渝分处合贴字第19832号1206渝秘字稽代电准予照签。从合约内容来看,丝业公司以所买之蚕茧及制成之生丝作抵押,并由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担保,四行按35:30:20:15的比例进行贷放。^③

1941年全年,在发种收茧方面,该年春季全川共发出蚕种280815张,丝公司收入鲜茧50577470公斤;秋季全川共发出蚕种293040张,丝公司收入鲜茧112938107公斤,秋季收茧成绩较之以往各年尚无逊色,春季成绩之劣则开从来未有之纪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粮食价格陡涨,养蚕无利,又历年土茧价高,农民不愿多育改良蚕种之故。在销丝方面,全年共销丝4000余担,其中90%以上,系售与富华贸易公司;“该年原料缫制者不敷成本甚巨,幸赖上年存料,成本较轻,盖以小部分匀度不足,不能运销海外之低级丝供应内销市场,售价尚佳,以资弥补”。在制种方面,全年各种场共制蚕种58万张,春季成本每张7元,秋季成本每张12元,“此乃人工、物价持续增高,自然之趋势”。在冷藏方面,在重庆添建冰库一所,“合原有者共得三库,将蚕种分贮在严重轰炸期中,蚕种尚得安全无恙,如期供给农村”。^④

(四)1942年融资及经营

1942年间,四联总处先后核准川省各丝绸厂收茧借款共14笔,计8694万元,其借款用途大都为购茧缫丝,购茧时期分春秋两季,春季茧讯在4—5月间,秋季茧讯在9月间,收茧地点以嘉定、南充、阆中、三台、西充、仁和、盐亭等地为主。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4 1942年四川总处核准四川各丝绸厂借款统计表

借款人名称	金额(元)	理事会核定(次)	借款用途	备注
四川丝业公司	20000000	117	收购春茧	总公司在重庆,收购地点:南充、三台、阆中、西充、仁和、盐亭

① “省府鉴于春季各方竞购蚕茧,省定茧价,无法维持,明令蚕种价售,改良蚕茧任人购买,并准其他商营种场,制造改良茧种,减轻丝公司独立发展川丝之责任,停止独家收购改良白茧之权。省府不定茧价,恢复自由市场,原有之蚕丝业管理办法大纲,修正后,政策为之一变。本公司仍当一秉初衷,尽力所及,对于吾川丝业有所贡献。”参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营业报告书”,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88。

②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函”,第235—236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88。

③ “关于办理四川丝业公司押借1941年秋季蚕种贷款事宜的函,附清单、合约”,第102—103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89。

④ “四川丝业公司1941年营业报告书”,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90。

续表 4

借款人名称	金额(元)	理事会核定(次)	借款用途	备注
四川丝业公司	57 630 000	140	收购秋茧	
普益经纬公司	600 000	121	收购春茧	厂址在嘉定
普益经纬公司	4 000 000	139	收购秋茧	
普益经纬公司	100 000	签呈	制保险伞	
德记丝厂	500 000	120	收购春茧	厂址在嘉定
福新丝厂	300 000	125	收购春茧	厂址在嘉定
新凤翔丝厂	600 000	126	收购春茧	厂址在嘉定
裕诚丝厂	500 000	125	收购秋茧	厂址在嘉定
张世兴绸厂	300 000	125	收购秋茧	厂址在嘉定
天孙绸厂	600 000	124、125	收茧秋茧	厂址在嘉定
龙兴绸厂	300 000	125	收购秋茧	厂址在嘉定
裕国丝厂	1 000 000	140	收购秋茧	厂址在嘉定
尊中丝厂	500 000	140	收购秋茧	厂址在嘉定
合计				86 940 000

资料来源：“四川丝业借款概况”，第33—35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88。

从表4来看,1942年丝公司向四联总处借两笔收茧款项,收购春茧贷款2 000万元,收购秋茧贷款5 763万元,合计7 763万元,约占该年四联总处核准川省各丝绸厂借款总数8 694万元的89.3%。一方面说明四川丝业股份公司几乎垄断了四联总处对四川丝业的收茧放款,其在川省丝业的地位是无人能比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收茧流动资金几乎全靠抵押借款来筹措。

1942年全年,丝公司生丝外销受时局影响颇为不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仰光相继沦陷,海运不通,金融紧缩,政府机关忙于自身之救济,或则难于照常补助,或则不能担负风险,董事会鉴于外销之毫无把握,周转资金之日益艰难,决定随同紧缩,裁并机构,减少职工,以渡难关。生产丝量只备供给川省内销之用,以2 000担为限;8个制种场停工3个,保留5个;7个缫丝厂停工2个,保留5个;桑园退租四分之一;职员、学员再减200余人。就其发种、收茧、制丝等业务来看,还算比较顺利。(1)春季配发改良蚕种225 425张,农人以茧价低廉,养蚕无利,不愿多育,故仅实销春种200 658张,剩余24 767张,奉令销毁;秋季配发改良蚕种200 980张,实销200 152张。(2)收茧制丝,春季收购改良茧706 828公斤,土黄茧254 529公斤;秋季收购改良茧754 502公斤;全年共收购鲜茧1 715 859公斤,共制生丝2 162关担,尚余一部分原料待缫。(3)制种,春季制改良种209 668张,秋季制改良种143 344张,全年共制蚕种353 012张。(4)销丝,全年销丝2 892关担,其中七成供给外销,其余一部分是上年存余不合外销之无匀度丝、一部分系历年选茧积存之双宫、黄斑、蛆血、薄皮等茧所制粗丝、杂丝及吊壳所抽大车丝,供给内地绸缎机户之用。“本年生丝数量原按川省上年内销数量而准备,殊同盟国以航空军用关系,仍需要公司所出匀度生丝,同时外销当局亦极力设法维持海外市场,不使中断,乃将原备内销之原料尽量改制合于外销匀度之生丝,全部提供同盟国之用。”此外,丝公司也为航空委员会订制特种条份生丝。“上述两项占本年销丝额之七成以上,一则因军用关系,不宜取利;二则外销方面,复兴公司尚须赔垫运缴。在本年度粮食原料、工资、五金、燃料高涨情形之下,不免亏蚀,幸有内销价好而各地绸厂机户乐于改用公司成品,以致历年积余杂丝获得销路,略资弥补。”^①

(五)1943年融资及经营

1943年,四联总处核准丝公司春季购茧缫丝借款为8 721万元,不过需要,自备垫头一成半;核准秋季购茧缫丝借款为9 660万元,自备垫头三成;制种费用全年约3 000余万元,悉数自行筹措。而丝

^① “四川丝业公司营业报告书”(1942年度),第5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5—0001—2004。

公司资本3 000万元,“已全部投资于厂场固定资本及购备各项材料,平时需用流动资金,除以销丝赎回余头应付一部分外,全赖高利向外拉借短期信用放款,以为周转”。1943年度,丝公司对外负债计中国银行丝茧押款8 000万元,月息三分(生丝每关担押借7万余元,按市价六折),短期信用借款4 600万元,月息七分,负担利息极重,尤以中秋节前后各地银根均告紧急,子金高至十分,当时适值收茧制种时节,需款殷繁,调度财务左支右绌,实觉困难万分。^①

1943年全年,丝公司业务完全遵照四川省政府1943年度蚕丝增产办法大纲之作业标准进行。在制种一节上,春季制改良种209 504张,秋季制改良种136 824张,全年共制346 328张。只是此项改良种,因原种逐年退化,养育时每易发生病状,故丝公司为根本改进原种起见,凡特呈准政府在北碚种场自制原种4 000余张。在发种一节上,春季配发改良种143 722张,实销142 788张,秋季配发改良种201 625张,实销196 472张,共销339 260张,较为顺利,不过“此项蚕种,皆系遵照省府规定,官价发售公司改良种,信用已经确立,农村视为必要,又因官价低廉,纷纷抢购,供不应求,黑市随处发生,私人投机粗制滥造,亦多混迹其间,结果病毒交染,死亡甚大,为害农村尤巨。”在收茧制丝一节上,春季收购改良茧551 455.23公斤,土黄茧294 471.81公斤;秋季收购改良茧458 492.22公斤,土黄茧1 304 419.26公斤。连同上年存茧,共制生丝2 062关担,“此项收茧数量亦系因受限价影响,仅及产量之半,其余半数流为土丝,至为可惜”。此外,“茧款领用周转过多,到达三台仅收得尾批蚕茧,亦为原因之一”。在销丝一节上,全年销丝2 060.50关担,遵照省政府及贸易委员会规定,以六成供应外销,计售予复兴公司者共计1 200关担,不合外销之无匀度丝,则直接售诸各绸厂、机户。1943年丝业公司损益情况为该年度销种收入819 808 134.90元,销丝收入8 174 743 242.78元,其他收入6 969 574.45元,共计收入8 201 520 952.13元,减去制种费用22 728 007.03元,缫丝费用125 578 149.60元,推销费用6 777 744.05元,管理费用14 304 452.18元,财务费用23 163 423.81元,净得利润8 969 175.46元。^②

(六)1944年融资及经营

就融资情况来看,1944年度借款子金特高,丝公司蚕种、生丝销路均疲滞,为此,丝公司业务再做紧缩。截至1944年8月23日至,丝公司短期负债17笔,计23 340万元:和成银行1 700万元、四川省银行500万元、永利银行500万元、江苏银行600万元、川康银行5 200万元、四川美丰银行3 300万元、华康银行550万元、通商银行1 600万元、中国农民1 000万元、中国银行1 550万元、四川省政府特种基金会5 000万元、中央信托局80万元、中国保险公司200万元、福钰银行100万元、巴县县银行260万元、振裕银号500万元、江苏农民银行700万元。连同其他借款5 060万元,一共合计2.84亿元。^③同年秋,丝公司收购秋茧需资向中国银行渝分行申请贷借1亿元,四联总处第235次理事会会议核准予贷借5 000万元,由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担保。^④

1944年全年,丝公司制成秋种22.5万张,其他种场制成秋种14万—15万张,比上年骤增了20多万张。尽管丝公司蚕种优良,在蚕农中早树信念,但是蚕种数量骤增,并且私人种场多利用当地人情关系、准许赊账、给人佣金等手段,倾销蚕种,以致丝公司蚕种发售大受影响,截至8月止,丝公司出库配发各区蚕种,计川东2.1万张、西充及南充5万张、阆中5万张、三台4.9万张,合计17万张,

① 1944年1月10日下午2时,重庆陕西路92号四川丝业公司本部,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25次董监联席会议,钱家骥主任报告1943年丝公司财务概况。参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5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第121—123页,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6—0014—0342。

② “1943年决算概况”(四川丝业公司),第129—130页,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6—0014—0342。

③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次常务董事会议记录”,第7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90。

④ “四川丝业公司质押透支国币五千元合同”,第329—332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93。

尚余5万张。^①另外,复兴公司对春季外销丝一再压价,丝公司获利甚微。7月15日,丝公司造具春季外销丝成本表,函送复兴公司,并分呈贸委会及四川省政府备查,贸委会代电嘱托仍照往例,即丝公司限于复兴公司谈洽后再行评价。起初,复兴公司仅给价每担28万元,与丝公司所开之38万元相差过远,随后,迭经商讨,丝公司同意去除每担营业税1.2万元及放弃10%之利润标准,让价为33万元,复兴公司仍嫌价高。复经董事徐广迟从中斡旋,29日,始定为31万元,在秋茧之前收货付款。30日,评价会议通过每担31万元的丝价标准,并决议营业税一项由复兴公司负担三分之二,丝公司负担三分之一。^②就财务状况而言,据监察人何静源在丝公司第八届股东常委会上的报告:1944年度损益计算,计销丝金额594 980 516.08元,减销丝成本448 577 333.57元,销丝利益为146 403 182.51元,又其他收益(计财务收益7 756 329.24元,房地产收益307 923.00元,投资收益649 95.38元,杂项收益6 070 735.32元)14 784 982.94元,以上收益总额161 188 165.45元,减除各项费用(计推销费用27 144 680.17元,管理费用50 163 496.33元,财务费用72 494 822.32元,杂项费用2 079 548.56元)151 882 547.38元(此项费用大概多系作账的手段,以逃避税收,如果不是这样,似说明经营效率低下),计获纯益9 305 618.07元,业由会计师谢霖纪、苏祖南审定,并经检察官查核无讹。^③从报告财务状况来,丝公司尚有纯益,实属难得,不过,一个销丝营业额达6亿元的公司,仅获利900余万元,可见从业之难,获利之微。

(七)1945年融资及经营

1945年春季,丝公司“共发川东、川北各县改良蚕种15万张,以每张产茧10公斤计,可收改良鲜茧150万公斤,其他土种黄茧尚不计在内,现估计茧价每公斤900元,庄缴每公斤100元,供需茧款15亿元,又上项鲜茧量,可缫丝2000关担,每关担缫丝费用估计约需20万元,共需4亿元以上,收茧、制丝两项共需资金19亿元,除由本公司自备三成垫头外,特请贵处惠允,按七成借款13.3亿元,俾资收购”。同时,考虑到5月初间鲜茧即大量登市,丝公司要求上项茧款必须于4月20日左右,以现钞分运川东北各县乡镇,方可济用;“至如改良茧设因产量关系不能收购足额,则加收黄茧补充,俾济需要”。另外,在收购春茧前,各项布置需费周转,因此,丝公司请求“在上项借款未借以前,请另提生丝100关担为担保品,先行支用5000万元”。3月,四川总处第263次理事会讨论了丝公司申请借款一案,理事会决议“准按该公司实际需要数额茧款6.5亿元、缫丝费1.5亿元,共8亿元,以七折贷款5.6亿元,期限半年,月息三分六厘,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及川康兴业公司承还保证,由中国、交通、中信、邮汇四行局按四、三、二、一比例承放,并指定中行为代表,由代表行选派稽核人员,在合约手续未办齐前,并准先用5000万元”。^④4月,四联总处代电称,为了方便办理起见,以丝公司向各行局贷款案改由建设厅单独承保。5月2日,丝公司将贷款5.6亿元合约未签妥前以生丝100关担作为抵押品所借5000万元之本息偿清。^⑤同年秋季,丝公司先向五行局洽订1945年秋季收茧、缫丝9亿元借款合同,后因用款比较急切,8月2日,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代电请求四联总处,“以收茧业务即将开始,各区茧庄购买炕柴,修理炕灶,派员发种,暨订购煤焦,在在需款,至为殷切,上项借款如待办理

^①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次常务董事会议记录”,第63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90。

^② 1944年9月6日,丝公司在重庆陝西路92号公司本部,召开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次常务董事会议,总经理范崇实就“春丝评价经过”一事向董事会作了报告。参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次常务董事会议记录”,第86—88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90。

^③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股东常委会会议记录”,133—134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91。

^④ “准四联秘书处代电为准四川丝业公司向五行局借款5.6亿元令仰遵办报查由”,重庆市档案馆藏,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全宗,档号0290—0001—0075。

^⑤ “准四联秘书处代电为准四川丝业公司向五行局借款5.6亿元令仰遵办报查由”,重庆市档案馆藏,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全宗,档号0290—0001—0075。

签约等手续须费甚久,拟请贵处于本月半间以前,先行惠付1亿元,以备各项庄缴之需”,呈请在借款签约手续办妥前,先行支用1亿元,四联总处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照办”。^①10月18日,四联总处代电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电称以四川丝业公司函请以本年秋制蚕种12万张借款一案,拟准按成本300元七折押借,共计2500万元,在押品未入冷藏库之前,允做贴现1500万元,四联总处第289次理事会决议“准予照办”。^②

1945年全年,丝公司有四项重要收获:(1)原种场自制原种已收较大成效;(2)副产品加工之各种成品销售畅旺,为丝公司增进收入不少,同时,丝公司又添办400锭机纺设备,利用低级丝筋弹棉纺纱,也已出货;(3)原料整理结果,纛折减少,制丝每关担比历年约省鲜茧30余斤;(4)立纛部分品质提高,可以接受任何等级生丝之外销订货。遭遇最大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秋季收茧问题,“秋季鲜茧上市之际,时值胜利突然降临,物价狂跌,同时,又值川北刚经过水灾,农村经济动摇,棉花、桐油价格下跌四分之三,尚无人买,南充丝商、绸厂纷纷倒闭,不可终日,川省内销丝价自每担240万—250万元跌至40万—50万元,上海丝价跌至每担20余万元”;丝公司丝厂缴费每担已需40余万元,因此,“丝公司收茧纛丝事业冒着巨大亏折之危险,停做一季,则农村比蒙受普遍惨重之损失,尤以茧价标准问题甚大,既不能照春季每公斤1100余元之高价,以过分亏累,又不可援照川南实验区每公斤230元之低价,以专取便宜,爰以当时粮价,比春季仅及一半为标准,公司所定茧价照春季茧价之一半,每公斤均价为600元,使蚕农半价售茧,半价购买粮食,与春季育蚕结果无差别”。丝公司顶着巨大亏累之风险,担负救济蚕农经济的重任。丝公司的这些作为,立即见到效果,“在顺保潼三府同时宣布茧价,庚即开庄收茧,丝绸顿时稳定,因而倒号之狂澜遂停”,不过,丝公司营业收入受到一定的冲击,“年终决算红酬低微,未能副我股东及诸同事之愿望”,1945年,纯益21725845.57元。二是工潮问题,南京、上海等地收复以后,朝野上下急于返乡,战时成立或遂政府西迁之工矿事业,或停或迁,同时政府为体恤外省劳工,出台相关规定资助有意返乡之工人,1945年冬开始发生工潮,并成风起云涌之势。^③

综上所述,丝公司携其政治资源优势,垄断战时川省改良蚕丝事业,然而其自身资本极其微弱不说,且原有之股本均投入制种场、茧庄、纛丝厂等机构的场(厂)址、设备等项目上,成为公司的固定资本,是故其制种、收茧、纛丝等业务所需之流动资金均需向外通融。丝公司融资渠道有两端:一是向四联总处申请抵押贷款,这部分融资的比重较大,占绝对多数;二是向市面融资,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资本所有者,比例较少,分信用及抵押两种。受此资本现状所制,丝公司年年需借款、季季需借款,且由于蚕丝业存有茧汛之特殊时期,丝业用款的季节性较强,以致丝公司每次用款均急迫,往往在合约未签订前需要提前预支部分款项,以解燃眉之急。这首先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方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即自有资本(或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过低,限制了行业再生产及新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影响到整个蚕丝业的发展;其次,丝公司的资本链与复兴商业公司、富华公司、中茶公司等官办公司形成了较大反差,后者有较为富裕资金来源。例如,复兴商业公司1938年成立时,即由财政部一次拨足营运资本1000万元,1940年6月对外贸易行政与业务划分后,贸委会由移交物资内划拨周转基金3000万元,同年8月,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总处抵押借款2000万元,之后陆续向财政部申请易货专款,到1941年底,公司获拨易货贷款2.84亿元。^④二者同为官办企业,一并服

① “关于核准四川丝业公司在借款合同未签妥前先行动支1亿元的代电、函、呈”,第23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94。

② “关于四川丝业公司以秋制蚕种押借2,500万元案电请复查理由”,第324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394。

③ “1945年度业务报告”(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72—73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89。

④ 郑会欣:《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务于国家的经济统制目的,但是,二者资本运作则有较大差异,丝公司则倚赖于银行业的资金融通,复兴公司则倚重于政府增资扩股,这一差异值得学界加以关注。

三、丝公司的努力与后方蚕丝业改良

尽管是依赖借款进行经营,并背负着沉重的利息压力,但是,丝公司一方面不负政府所望,作为是政府统制蚕丝业的主要机构之一,担负改良蚕种、增加外销生丝生产等重责,另一方面不负商民之托,秉持企业为社会服务公德之宗旨,积极救济蚕农,维护蚕桑经济。^①

(一) 培育原种

1934年前,川蚕品种均以自留或购买之土种饲养,改良种仅供学校机关之试验。自1936年春起,川省建厅在南充设立蚕桑改良场,从事制造改良种,并禁止私人经营,“需用原种一项,亦全部仰赖江浙输入,如此由气候地域是否适宜,姑置不论,即就运输而言,亦诸感不便”。^②不久该场归并于丝公司,丝公司将制种场扩展为南充、西充、盐亭、三台等10地。自1937年春开始,改良场着手建筑原种室及附属室等,饲养原蚕,但是仍不足各种场所用,在1938年时仍需江浙蚕种大量接济川省。1940年,川省府开放制造蚕种事业,准许私人经营种场,改良蚕种数量遂逐年增加,原种需求与日俱增,是年,川省政府又增设成都原种制造场一处,不过于1942年停业。1943年,北碚蚕种场增设原种部,开始培育原蚕种。到1944年春,碚场制造原种3500张,不仅满足丝公司各场全部自给(公司以秋季作业减少,自用仅1000多张),还接济其他私人种场。同年8月初,丝公司奉省府电令,碚场所制造之原种,供给涪滨、嘉陵、文峰、福民等各场之用。另外,丝公司培育原种品质优良,而南充改良场1944年所制原种毒率超标,因此,私人种场纷纷请求政府购买丝公司原种。^③

表5 蚕丝改良场十年来原种培育数量表

年次	春制原种(张)	秋制原种(张)	合计(张)
1937年	2 009	684	2 693
1938年	7 177	4 121	11 298
1939年	12 000	10 239	22 239
1940年	21 970	3 600	25 570
1941年	10 156	6 760	16 916
1942年	2 650	6 310	8 960
1943年	6 091	7 971	14 062
1944年	6 745	740	7 485
1945年	3 583	1 308	4 891

资料来源:杨碧楼:《十年来之四川蚕丝业》,《四川经济季刊》1946—1947年第4卷第1期。

① 近代以来,川省各界一直致力于改良蚕丝业。清末,陈晚溪、周孝怀等人先后倡议缫丝厂及蚕桑传习所等机构,并效法江浙缫丝办法,努力提高川丝产量及品质,使其得以行销省外。20世纪20年代,川丝年产量达到3.5万担。之后,在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丝业竞争及人造丝进口激增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丝业整体趋于衰退,川丝也自此开始衰落。1930年,7家铁机缫丝厂联合组成久和公司,从事出口生丝制造,不久因故而以失败告终。1932年冬,经由四川善后督办总署下辖之川丝整理委员会提议及政府大力提倡,川省11家机械丝厂联合组成大华生丝贸易公司,除募集现金作为股本外,各厂家之厂基、机车等财产亦均抵借款项加入股本,但因经营失败,除投入资金完全折损外,尚需政府代其偿还50万元债款,该公司遂被川丝整理委员会接收。1935年川政统一后,卢作孚出任川省建设厅长,便着手对川省蚕丝业进行改良,以谋振兴。1936年,卢作孚创设蚕丝改良场并改组成立四川生丝贸易公司。参见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5—46页。

② 杨碧楼:《十年来之四川蚕丝业》,《四川经济季刊》1946—1947年第4卷第1期。

③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次常务董事会议记录”,第64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90。

从表5来看,四川蚕丝改良场战时原种制造分春制种及秋制种两项,其中在1940年达到制造高峰,是年制造原种量为25 570张,之后,原种制造量呈下降趋势,到1945年时仅为4 891张。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其一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滇缅公路中断,国际丝市“似乎有发生根本变化之虞,那时资委会对于以后外销丝不敢表示照常负责收购”,丝公司“只得以内销容量为标准,而紧缩其生产计划,当即停办蚕种制造场5所,停办缫丝厂3所,出售桑园三分之一,职员实习生由1 700余人减为700人”,^①受其影响,川丝一蹶不振,之后,虽经政府努力提倡,然衰退之势不可止;其二,1943年财政部贸易委员统购统销办法公布实施,生丝由所属复兴公司统制购销,生产缫丝部分由丝公司及乐山蚕丝实验区分别办理,商人不得自由买卖,“蚕农、丝商以收购官价低于生产成本,而且捐税繁重,无利可图,纷纷砍桑歇业,丝业遂不可收拾”^②;其三,北碚蚕种场制造原种数量逐年增加,1943年制造原种6 697张(春制2 762张、秋制3 935张),1944年10 639张(春制5 213张、秋制5 426张),1945年11 965张(春制7 076张、秋制4 889张)。^③

丝公司所属之蚕丝改良场及北碚制种场的原蚕种培育,改变了战前无原种制造的局面,一方面,减免了长距离输入原种的负担,满足了川省蚕种制造场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土种饲养均以春蚕为主,极少饲秋蚕,因此,为增加饲养次数,以期增加产量,于是川丝公司在北碚、南充两地设立冷藏库,利用人工孵化,遂有秋蚕之饲养,“开川省秋种制造之新纪元”。^④

(二)推广改良蚕种

四川蚕丝改良场成立之后,开始着手规划川省蚕业推广事宜。1937年时,改良场仅在川北重要蚕区设立指导所10所,从事配发蚕种及指导事宜。试验结果甚佳,指导区遂逐渐推展。1938年秋,为应推广事业发展之需求,蚕业推广事业从蚕丝改良场分出,单独成立四川蚕丝推广委员会,专门负责川省蚕业推广事业。该会成立时,划定江北、巴县、合川、铜梁、璧山、南充、西充、三台、盐亭、射洪、阆中、苍溪、仪陇、南部等14县为推广区域,设置江北、合川、南充、西充、盐亭、三台、阆中等7个蚕业推广区,并附设指导所62处。之后,复又增设,到1939年秋时指导所达92处;1940年春时指导所达97处。1942年川省府经济感困难,紧缩蚕业推广事业,1943年时,更感无以为继,将蚕丝推广事业交由丝公司兼办。^⑤1943年12月23日,四联总处代电中央银行,要求其转电南充支行^⑥与四川丝业公司接洽,让其接办川北川东蚕种推广任务,具体办法为:(1)川东、南充、阆中、三台4推广区改良蚕种推广指导任务,1943年度受政府之委托,由本公司接收办理之。(2)1943年度川北、川东丝公司经营区域内推广经费由丝公司负责,计入改良白丝成本之内,如政府给予补助费时,按照实领金额应摊减;内外销之改良白丝成本,此项补助费由丝公司出据承领,并入公司一般经费内开支,结账不另向政府报销,以省手续。(3)推广区现存人员愿在公司服务者,得就实际需要个别商聘或选用,其待遇、调遣与一般职员同,其名义为技术员、助理技术员,系指导外,担任一般厂处庄工作。(4)推广区现有房屋、财产、器具,其原由公司借用者,悉数收回,其由政府自行购置设备者,由政府处理。(5)推广区所有一切内该外欠或未完事件,概由各推广区自行清了,公司不负责任。(6)推广指导任务1943年度即本丝公司业务项目之一,公司遵奉政府主管机关之监督、指示、命令,由主管机关,对总公司直接行之。(7)公司于总公司技术室内添设蚕种推广股,各区办事处内设蚕种推广股,办理推广指导技术事项。(8)私人种场所制合格蚕种,或由丝公司商洽议价接收,或自行售卖,均无不可,由公司议价接

① 罗承烈:《四川的蚕丝业》,《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3期。

② 李守尧:《四川之蚕丝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2卷第3期。

③ 杨碧楼:《十年来之四川蚕丝业》,《四川经济季刊》1946—1947年第4卷第1期。

④ 杨碧楼:《十年来之四川蚕丝业(续)》,《蚕丝杂志》1948年第2卷第9期。

⑤ 杨碧楼:《十年来之四川蚕丝业》,《四川经济季刊》1946—1947年第4卷第1期。

⑥ “关于南充丝绸业因产品滞销申请借款案委座电示各节复请查照由”,第110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699。

收者,其冷藏浸酸配发皆由丝公司负担;其自行售卖者而请求寄库者,应先收冷藏浸酸配发等各项费用;其售卖区域数量、价格与丝公司之蚕种应一律遵守政府之规定办理,不得自由行动。(9)各区尚存桑苗圃,不在委托接收办理之内。^①

(三)改进缫丝技术

1944年8月,应高品质外销生丝生产要求,丝公司特开办立式缫丝车120部,初步试验较为满意。^②到1945年各方面均有一定收获:(1)原种场自制原种已收较大成效;(2)副产品加工之各种成品销售畅旺,为丝公司增进收入不少,同时,丝公司又添办400锭机纺设备,利用低级丝筋弹棉纺纱,也已出货;(3)原料整理结果,缫折减少,制丝每关担比历年约省鲜茧30余斤;(4)立缫部分品质提高,可以接受任何等级生丝之外销订货。^③

战时,就川省缫丝厂规模而言,以四川丝业公司为最大,其他稍具规模者,有筠连腾川丝厂、乐山、新华、新风祥、聚源、裕利、南充建川实业公司等家,其余多系土法人工缫制,亦有农民自养自缫者,其车数及产量无法估计,但因设备不全,产品均为内销丝,不合外销之用。四川丝业公司自1937年大华生丝公司改组成立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在南充、三台、阆中、成都、上海等地均设有办事处,有缫丝厂5处,缫丝车2461部,副产品工场1处,制种场6处,冷藏库2处,成为战时川省蚕丝业中的托拉斯企业,战时改良茧种制造、收购及外销丝缫制等业务绝大部由四川丝业公司所掌握,其缫制的外销丝再由富华公司(后并入复兴公司)及复兴公司转销国外,由此可见,四川丝业公司在战时川省蚕丝业救济、发展及政府易货借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总之,从培育原种到制种改良蚕种,再从推广改良蚕种到改良蚕丝技术,战时,丝公司在改进川省蚕丝业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虽不乏有批评之声,^④但这些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方蚕丝业的改良及发展。

四、战时金融与后方蚕丝业发展

战前,中国金融机构多有偏重。“我国银行业均麇集于滨海沿江,尤以聚集江浙两省为多,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则以关山险要,交通阻塞,经济落后,资金枯竭,金融机构为数甚少,甚至竟付阙如。”^⑤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南、西北为基地的大后方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根据地。政府为谋贯通内地金融脉络,适应军事需要,发展后方经济起见,出台一系列金融措施,推动后方金融机构的建立。如1938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拟订“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规定凡后方与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之城镇乡市,倘无四行之分支行处者,责成四联总处,至少指定一行前往设立机关。1939年9月8日,又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以活泼地方金融。就四川一省而言,四联处根据办法纲要进行改组,并分三期在四川设立金融机关,截止到1942年底,国家四行在四川境内实际增设行处为116处(重庆25处,其他县市91处)。^⑥大后方

① “四川丝业公司接办川北川东蚕种推广任务办法”,第132—133页,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6—0014—0341。

②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次常务董事会议记录”,第67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90。

③ “1945年度业务报告”(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72页,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全宗,档号0356—1—0089。

④ 高振著文从蚕丝政策不合时宜、制种量少而成本太高、原料耗损量大制丝成本太高、茧价无法提高易致农民反对、走私问题未可忽视、未能以技术为中心等方面批评政府丝业统制及丝公司垄断川省蚕丝业经营,要求通过开放制种、蚕种自由买卖、收茧制丝自由经营、改进管理机构倚重技术人才等手段改进四川蚕丝业。氏著:《改进四川蚕丝业管见》,《现代读物》1939年第4卷第9—10期。

⑤ 张禹九:《抗战以来四川之金融》,《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1期。

⑥ 张禹九:《抗战以来四川之金融》,《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1期。

金融网的形成,^①既为丝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资金较为充足的融资环境,也丰富了蚕丝经营者的融资手段。

(一) 丝公司的成功是金融业与蚕丝业良性互动的典型个案

从丝公司股本构成、融资渠道、经营活动等情况来看,丝公司属于借贷型企业经营,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等事业,完全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由此可见,蚕丝业的改良及发展与近代金融业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丝公司自成立以后,不断增资,并陆续扩充规模,到1942年,收并添配缫丝厂10所,扩大及新建制种场11所,敷设茧炕800余眼,推广蚕桑区20余县,桑园面积2000余亩,办蚕丝训练班5所,培养学员1000余人。从生产方面来看,自1936年起,蚕种生丝产量为:1936年购种8000张,缫丝27832公斤(460关担);1937年制种121030张,缫丝88572公斤(1464关担);1938年制种533069张,缫丝160022.05公斤(2645关担);1939年制种603945张,缫丝350779公斤(5789关担);1940年制种733500张,缫丝121242公斤(2004关担);1941年制种576698张,缫丝124025公斤(2050关担);1942年制种353012张,缫丝148900公斤(1800关担);1943年346828张,缫丝124751公斤(2063关担);1944年制种336155张,缫丝114768.5公斤(1897关担)。^②从上面各种统计数字来看,1939—1940两年丝公司极一时之盛,1940年以后,因受统制政策及太平洋战争影响,各方面逐渐萎缩。公司具体财务状况参见表6:

表6 1937—1945年丝公司逐年盈余、股息、红息一览表

年份	盈余	股息	红息
1937	44 221.14 元	八厘	二厘二丝五毫
1938	175 709.27 元	八厘	一分二厘
1939	742 369.73 元	八厘	一分
1940	528 131.93 元	八厘	一分
1941	1 521 159.30 元	八厘	二厘二丝五毫
1942	7 381 964.29 元	八厘	四厘
1943	8 969 175.46 元	八厘	六厘五丝
1944	9 305 618.07 元	八厘	六厘六丝六毫
1945	3 725 845.57 元	八厘	七厘一丝四毫

资料来源:林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1946年第10期。

从表6来看,战时丝公司年年有盈余,且盈余年年有增长(通胀因素不计),红息虽有下降,然而股东亦年年有分红,由此可见,其战时经营活动是成功的。丝公司是金融业与后方蚕丝业之间联系的关键节点,它发挥自身优势,将近代金融业的资金吸纳到后方蚕丝业经营上来,一方面拓宽了近代金融业的业务范围,另一方面融通了后方蚕丝业的发展资金,既密切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两个行业的发展。

(二) 金融业组织成立蚕丝企业公司,推动省区蚕丝业发展

前近代,西南五省川、黔、桂、滇及西康均产丝,但除川省外,其他各省的蚕丝产量颇少,在我国产丝地位上所占分量极小。战时,西南地区“新的丝业建设是应着抗战建国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计划的实施以川省和云南两省为中心,从金融上技术上着手,凡新的设备,新的种子,新的知识技能,都尽量设法推广,以期由小规模扩充到大规模,由一地方而普遍到各地方。”^③例如,在战时云南

① 战时后方金融网的相关论述可以参见黄立人《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及衰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王红曼《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张朝晖《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林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1946年第10期。

③ 蒋君章:《战时西南丝业问题》,《训练月刊》1940年第1卷第6期。

省,银行界主办的丝业机构有两个:蚕丝新村公司及云南蚕丝股份有限公司。蚕丝新村公司是中国银行和富滇新银行合资经营的,资本1 000万,在开远县拟垦荒2万亩,专供植桑之用,1940年时垦植桑树2 000亩,“将来并拟设置丝车500台,分6年完成,预计自栽桑、制种、养蚕、以至缫丝,均采用最新式经营方式,应用新技术,饲育新品种,俾得最优良之丝茧。这个计划相当伟大,可以说西南新丝业的生力军,也可以说是战时丝业的最伟大最理想的建设”。云南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缫丝的组织,是由富滇新银行投资经营的,最初资本50万元,厂址设于滇池旁之干沟尾,1939年3月开工,“备有最新回转式立缫机百台,成绩之优,已有事实可证”。^①

(三)金融业积极注资丝业,稳定丝业金融市场,缓解丝业危机

1941年后川丝每况愈下,例如,在1943年,川北蚕丝中心南充遭遇严重丝业危机,自该年8月底开始,丝绸价格逐步下跌,银根奇紧,因而倒闭风迭起,市况混乱不堪,该月倒闭商号如表7:

表7 1943年8月南充倒闭商号

牌名	经营业务	倒搁总数(万元)	大致成头
成泰	绸布	150	九
源记		150	九
精一	绸厂	400	九
新新	百货	140	八
明明	百货	80	八
蒲长兴	代庄	60	六
林伯勤		290	六
袁守仁	木材	70	六
复兴绸布号	绸布	520	六
怡新		100	四
义利荣		40	五
群力绸庄	绸布	330	五
聚珍		160	二、三
德胜绸厂		450	二、三
永大		500	二、三
金宝银楼		280	二、三

资料来源:“为统报南充市先后倒闭数目暨损失大概由”,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5—1—899。

从表7来看,1943年8月,南充市先后倒闭的商号有经营绸布、百货、木材的,有开绸厂的、也有作代庄的等等,一共16家,“综计各家倒搁总数已达3 720万元,以实余成头计,其损失几为总额之半。如以南市放款总架面计算,被搁置数,已近其半,则其损失亦将及四分之一……市面昏昏,风声鹤唳。”^②同年9月,又相继有数家倒闭,具体情况见表8:

表8 1943年9月南充倒闭商号

牌名	经营业务	债额总数(万元)	牌名	经营业务	债额总数(万元)
恒新	百货号	100	黄义隆	什帮	210
卢炳南	洗房	80	新记	机户	20
钦记	绸布	250	祥义源	什帮	200
源昌	绸布	150	王子谦	山货	50
冯仲平	经纪	320			

资料来源:“为报市场续有倒塌及利率汇兑情况由”,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5—1—899。

① 蒋君章:《战时西南丝业问题》,《训练月刊》1940年第1卷第6期。

② “为统报南充市先后倒闭数目暨损失大概由”,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5—1—899。

如表8所示,1943年9月份,南充又倒闭商号9家,涉及金额达1380万元,“如此巨额资金之冻结,其影响于市场金融之活动,至属重大……筹措银根已大生困难。”

为安定南充县金融市场,救济丝绸业危机,1943年9月17日,南充地方政府机关、南充商会及丝业公会代表在南充县商会内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县长王文彝主持,出席人有武焕尧、陈济光、奚致和、林全九、吴光普、李询刍、侯庆五、雷治平、张锡兆、文绍周、文济川、范佐臣、吴俊夫、王文彝等人,列席人员有专员陈开泗,地方法院院长王世泽,党部督导员李亚东,省立高蚕职校长尹良莹。会议鉴于丝公司“初拟2000余万元,收购西南四县秋茧,款茧不敷甚巨”,决议:“请中央银行以法定利息核拨巨款交由本县银行公会监督以低利办理上等丝绸茧储押贷款,以促成本县丝绸业之改进;约同西充绅民合组西南合作丝号,措集股款,至少3000万元,设庄收茧、缫丝以救济当前蚕农痛苦,其办法如下:由本县银行公会督同省行及各商业银行、钱庄,以投资方式投资或极低利息借款,至少1500万元,另行筹募1500万元,收购丝公司无力收购之余茧;租用丝公司部分茧庄及设备;请托缫丝公司代缫扬返丝,俾利销市”。^①

与此同时,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陈开泗、南充县长王文彝、县党部书记长吴光普、县参议会议长王复初、县商会理事长侯庆五,总工会理事长秦起蕃等人联名致电四联总处请求贷款救济南充蚕丝业,铣电称“南充为川北经济中心,农工商业向颇活跃,而支持农工商业之主要物资又为丝绸茧三项,迩来丝绸销场疲滞,经营工商业者存货过多,求售不得,资金缺乏,周转不灵,已纷纷发现搁浅,现象如本市力群绸庄、陈银洲机户等10余家,差款1400余万元,金融市场因亦动摇,若不早事救济,事态将愈继续扩大,不独本市受其害,波力所及,牵连全国金融。而秋茧转瞬又届登场,以发出之茧种计算,全县产茧总值为1亿余元,此间丝业公司宣布该公司在此地购茧款项仅2千余万元,产购相差额至巨,若不设法收购,农村经济必至破产,挖桑毁种势将随之,匪特危害地方生产,抑且影响国际贸易,危机已成,急待救济,钧部为国家金融中枢,扶持地方生产,安定社会金融,素极垂注,特请飭知此间中行(中央银行)拨款1亿元,以半年为期,息金一分二厘,贷与银行公会办理丝绸茧三项物资转抵押,并由地方组织监督机构,以期实惠在民,而免弊窦,事机迫切,望于9月底以前拨款救济,迟恐于事无济”。^②另外,南充县银行同业公会报告“年来各行均以南充息高争相设立,昼夜放款,助长商人囤积,各厂付出利息既巨,受跌价损失遂致倒闭,影响工业非浅”。

四联总处接到铣电及南充县银行同业公会报告后,立即致电南充中央银行,询问南充丝绸业现状、现存丝绸确数、滞销原因、已经收茧滞销等情形。10月11日,南充中央银行致函四联总处,呈报“南充丝茧绸滞销原因及现况”,指出“各丝绸厂存货过多,寸头不敷周转,再受利高影响,以致截止到目前,搁浅不能办理收交者,约27家,其中以经营丝绸者为多,数额在4000万元以上,若不急于急救,势必相互牵连,致南充唯一之生产丝绸市场全部毁减,影响金融,实非浅鲜”,请求转电准予贷放。^③

五、结语

综上所述,首先,从组织成立到业务开展,从股本构成到借贷性经营模式形成,从独享改良蚕丝事业权利到推动蚕丝业改良事业,丝公司各项业务的展开无不深深烙上政府丝业统制的印记,丝公司是战时政府实施丝业统制的一部分,因此,不难看出,战时后方蚕丝业的改良及发展是在政府干预抑或统制下进行的,是国家行政力量通过间接手段推动的。

其次,无论管制外汇与统制丝业,还是改良蚕丝业及推动后方蚕丝业发展,均需要大量资金来支

① “为安定南充县金融市场,救济丝绸业危机临时紧急会议”,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档号0295—1—899。

② “财政部快邮代电”(91154),第97—98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699。

③ “陈南充丝茧绸滞销原因及现况请鉴核”,第104—106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档号0285—0001—0699。

持,丝公司的战时融资及经营活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从丝公司历年融资情况来看,其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业务所需流动资金均要向外通融,主要渠道是向近代金融业抵押借款,且年年借款、季季借款,战时川省蚕丝业经营活动的维持多有赖于国家行库的金融支持,由此可见,战时金融业与后方蚕丝业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

再次,在总资本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小,而流动资本所占比重则愈来愈大。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战时手工行业经济与近代金融业的契合度加强了,手工行业所调动的资金量增大了,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优势,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而另一方面,借贷成为常态,固定资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小,流动资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大,这就说明手工行业经济本身的资金力量仍较脆弱,因为,借贷融资不同于公司发行股票融资,借贷是需要负担利息的(甚至是高额的利息),发行企业股票只分红利而不负担利息,同时,流动资本越大,说明借贷额度越大,那么其所负担的利息也就随之愈重。很显然,一旦大部分的收益用于偿还利息,手工行业就没有多少剩余资金从事行业再生产及新技术的投入,最终,行业资本构成的不合理性必然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因素,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The Rear Silk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Anti-Japanese War from Financing: Based on the Action of Sichuan Silk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1938 - 1945)

Zhao Guozhuang

Abstract: China silk industry had fallen into the crisis for the world economy slump and sale structure change in the 1930's. Sichuan Silk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which was a trust company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have set up to conquer the silk industry crisis. Cultivation of silkworm eggs, purchasing of silkworm cocoon, silk reeling and transportation were all depended on the capital of modern financial industry because Sichuan Silk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have not sufficient share capital. Though her poor financial situation, her hade contribut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ilk crisis and to improve the technique of the rear silk industry. The financing and operation of Sichuan Silk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have proved that there wer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y control and silk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silk industry, poor capital structure of the rear silk industry.

Key Words: China's War with Japan; Sichuan Silk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Financing of Silk Industry; Silk Industry in Rear Area

(责任编辑:王小嘉)